

中国 农村 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期刊网（CNKI）入选集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7年卷·下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农 村 研 究 院

中国 农村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2017年卷·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研究. 2017 年卷. 下 / 徐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203 - 2311 - 6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农村经济—研究报告—中国—2017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13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84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农村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 勇 邓大才

执行主编/编辑 李华胤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文	马 华	邓大才	王 静	王 勇
王义保	石 挺	卢福营	冯春风	刘义强
刘金海	刘筱红	李海金	朱敏杰	任 路
汤晋苏	肖盼晴	何包钢	应小丽	吴晓燕
陆汉文	陈军亚	张向东	张利明	张晶晶
胡平江	郝亚光	徐 勇	徐 剑	徐小青
徐增阳	董江爱	黄振华	詹成付	彭正德
熊彩云				

目 录

【本期特稿】：农村妇女口述史研究

主持人语：性别正义的信息基础：农村妇女口述史的

意义 刘筱红（3）

性别平等意识下乡：土改时期的妇女动员机制研究 唐丹丹（5）

农村集体化时期女干部身份认同的性别困境：口述史的

集体记忆 胡 丹（27）

制度结构与心智构念的选择：集体化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
再形塑

——基于农村妇女口述史的分析 余成龙（54）

村干部的政策执行策略：地方性知识运用与政策投机

——基于农村计生干部的口述史分析 王 锐（88）

【专题研究】：宗族、国家与治理

血缘关系韧性：国家与宗族关系的新认识

——基于广东蕉岭县福岭村陈氏宗族的调查 白雪娇（117）

组合型权威：传统宗族村落的权威形态及其治理

——以江西郭氏符竹村为例 傅熠华（132）

分合均衡：明清徽州宗族有序治理的内在机制

——以安徽歙县雄村曹氏宗族为例 李鹏飞（146）

【博士论坛】：产权、公共服务与乡村治理

合作性产权：传统乡村场域中地权的界定、维护与治理

——基于洞庭湖区湖村的形态调查 史亚峰 (165)

组织化供给：传统村落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及当下启示

——基于重庆河村“会社”的历史形态调查 晏俊杰 (179)

当代农村发展与治理

农民工非制度维权偏好的代际差异研究 杨翠萍 贺婧雅 (195)

基层政权、下乡资本与农户：农地流转中影响农民利益的

三维透视

——以成都市郫都区花园镇为例 阳 斌 (213)

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之路：历史进程与结构力量

——与阎云翔商榷 刘小峰 孙建伟 (230)

海外农村研究

国家何以成功：家团底色下的韩国“新村运动”研究 胡 军 (243)

【本期特稿】：农村妇女口述史研究

◆ 性别平等意识下乡：土改时期的妇女动员机制研究

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受到长期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受困于家庭生活，自我封闭，政治参与度比较低。随着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推动，社会平等意识逐渐深入农村，农村广大妇女的社会行为开始发生巨大改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全国多个地区的农村妇女进行口述史调查，以历史见证人的亲身讲述，探讨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社会平等意识是否确实实现了下乡，并以妇女动员的口述材料分析其下乡实现的途径与结果，以及下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偏差。土改时期的社会平等意识下乡，对于我们当下妇女解放的实现路径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通过话语权的掌握以及评价标准的重新制定，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更有效的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的下乡，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

◆ 农村集体化时期女干部身份认同的性别困境：口述史的集体记忆

农村集体化时期，一些农村女性精英在国家建构中经历了政治化过程，走上从政之路，成为了女干部。在这个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农村政治权力结构领域，女干部的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出现冲突，干部的“去女性”偏好和女性“去干部”的文化，使其陷入了分裂的身份认同性别困境中。阿玛蒂亚·森认为，将复合的身份割裂为单一的身份认同，是隐含歧视的身份幻象。对农村女干部的认同，割裂为“女性”和“干部”两种身份，是集体化时期社会在型塑女干部时，集体无意识的选择性使用“单一而又涵盖一切的标准”，造成了这个群体身份认同的性别困境。转变对农村女干部这种单一幻象的身份认同，建构具有包容性、建设性的多元身份共识，创造条件，提升女干部自由的能力是农村女干部发展中必须突破的玻璃屏障。

◆ 制度结构与心智构念的选择：集体化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再形塑——基于农村妇女口述史的分析

绵延千年的家户制度形塑了农村妇女多生多育的意愿，随着集体化步步深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劳动单元的集体化，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要素发生了变化，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个体家庭而言，生产资源的生长不再与人口的增长直接相关；而资源的分配则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而紧张；妇女参与集体劳动并没有减少其原本承担的人口生产的劳动付出；而长达几十年的性别平等观念下乡，唤醒了农村妇女的主体意识，超出负担的生育与她们个人的人生困苦存在因果关联。结构的变化重塑了农村妇女关于生育的“心智构念”，她们的生育观念从着眼于家庭发展的“多子多福”，转变为基于女性自身体验的“儿多母苦”，生育意愿出现了下降。研究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的真实情况及其社会根源，旨在揭示中国人口生育率能够迅速下降，是在农村妇女出现明显节育意愿时，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的结果。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下降的根源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

◆ 村干部的政策执行策略：地方性知识运用与政策投机——基于农村计生干部的口述史分析

基层官僚在政策执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公共政策在熟人社会执行时既要依靠基层官僚的熟人优势，充分运用地方性知识等策略，又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政策投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年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难事”。身处计生政策执行一线的村干部，面临来自上级组织的高压和乡亲村民的激烈反应，在政策执行的情境危机中，采取种种策略平衡矛盾，维护关系，不仅缓和了当时国家与村民的紧张关系，也推动了计生政策在熟人社会的执行。村计生干部的口述经历，是分析基层官僚政策执行策略的典型范例。多案例的政策执行策略分析，蕴含了丰富的因地制宜的政治智慧和扮演“中间人”的政策投机。

主持人语： 性别正义的信息基础： 农村妇女口述史的意义^{*}

刘筱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性别平等属于正义的价值范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总结，正义的形式特征是“相同的人相同对待，不同的人不同对待”。如何判断“相同”与“不同”的人的实质性差异，阿玛蒂亚·森提供了“信息基础”作为解释和分析的框架。以信息基础为手段，进行信息选择——纳入或排除，作出理论支持或实践决策。信息基础对各种正义理论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这一信息基础又是建立在历史、现实信息的分析与解释之上。

当下，有关农村妇女的历史及现实的信息处于多重边缘状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妇女解放、性别平等提供了宏观的分析框架，较之其他的妇女理论更接近性别关系的本质。囿于大时代、大革命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并未将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处理，妇女解放运动从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其理论预设是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被打破，妇女就自然获得了解放。因此，在革命的大旋律中，性别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边缘协奏。现代化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演展过程，城市不仅是吸纳各种资源、运作各种资源、发布各种资源的中心，也是记录、研究这一过程的中心，而农村则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地带。尽管在民族危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农村妇女均作为“伟大的人力资源”

^{*} 刘筱红(1957—)，女，河北临西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公共政策分析、基层妇女参政问题、行政文化与行政管理现代化。

被动员、吸纳和组织起来，但她们在大多数场域缺席于决策主流位置，往往扮演着追随者、听众甚至看客的边缘角色。作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信息基础中，有关农村妇女的历史及现实信息或者因为“无关紧要”而被过滤、或者因为学术的宏大叙事而被单调片面化甚或谬误、或者因为底层的琐细而被遗忘。

于是，一方面是建构社会正义的信息基础往往缺乏性别盲点，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盲点，另一方面是蕴涵丰富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记忆载体，导致农村老年妇女的落花流逝。时不我待，稍纵即逝，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80 岁以上农村老年妇女口述史调查于 2016 年拉开序幕，至今已完 成 1300 多位农村老年妇女的口述史记录，访问的老人分布于 29 个民族，形成了 2800 余万字的文字记录，逐渐积累成有关中国农村妇女近 80 年历史状况口述史实录资料库。本期推出的有关农村妇女口述史研究的 4 篇文章，是对这座研究宝库初始一瞥的研究，其中包括 1949 年以来性别平等意识下乡的路径、历程及存在的问题、农村集体化时期妇女干部身份认同的性别困境、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等内容，文章以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有意思的学术发现。因为初始，仅为探索。一是分析资料仅为入门，二是研究的主题还可更集中。相信我们身居宝山之中，会进行更为努力的探索发现，并与各位同仁分享我们的调查资源和研究发现。

性别平等意识下乡： 土改时期的妇女动员机制研究^{*}

唐丹丹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受到长期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受困于家庭生活，自我封闭，政治参与度比较低。随着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推动，社会平等意识逐渐深入农村，农村广大妇女的社会行为开始发生巨大改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全国多个地区的农村妇女进行口述史调查，以历史见证人的亲身讲述，探讨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社会平等意识是否确实实现了下乡，并以妇女动员的口述材料分析其下乡实现的途径与结果，以及下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偏差。土改时期的社会平等意识下乡，对于我们当下妇女解放的实现路径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通过话语权的掌握以及评价标准的重新制定，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更有效的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的下乡，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社会平等意识；妇女动员；妇女解放；土改时期

一 引言

“在任何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 妇女

^{*}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筱红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作为政策和理论依据的深度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16JJD810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15JJDZONGHE009）。

作者简介：唐丹丹（1991—），女，汉族，湖南岳阳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国农村妇女口述史调查中心组成员。

问题作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始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长期以男权为中心，妇女则长期被迫处于被束缚、被剥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下所形成的夫权社会，让广大的农村妇女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各种压迫、奴役、纲常伦理的束缚，甚至是被当做依附、从属于男性的附属品，社会地位极地。毛泽东同志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权力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了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2]。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大绳索从妇女出生到死亡都紧紧的禁锢着她们，将其困于家庭中，束缚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各种压迫，而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公平对待。

回顾历史，中国的性别平等发生于 20 世纪以来中国跌宕起伏的政治大变革之中，农村妇女在时代的推动下逐步实现了角色的变迁。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民国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就逐步开启了整合妇女的过程，但当时轰动一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并非是以农村妇女为主导力量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通过妇女动员的开展，妇女才逐渐发挥起重要的革命作用。毛泽东始终认为妇女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并通过一系列动员活动，将妇女从“台后”带到了“台前”，成功推动了社会性别意识在农村的发展，并因此奠定了往后至今 60 多年的性别平等的发展道路。

本文通过大规模的口述史调查，发现经过土改时期的妇女动员，社会平等意识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基层有了一定的提高，长久以来被禁锢的妇女在家庭、婚姻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土改时期，社会平等意识下乡主要的口号是要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由此引发了本文要探讨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男女一样？社会平等意识是否真正下了乡？如果确实下乡了，是如何下乡的？社会平等意识在下乡的过程中主要是沿何种路径实现的？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社会平等意识下乡是否存在一定的偏差？本文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探讨，过去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性别意识下乡有何借鉴意义及其道路选择的问题。

本文的所有研究材料均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其近年来在全国进行了农村妇女口述史调查和土改口述史调查，调查员访谈并记

录了上千份全国各地 80 岁以上女性老人的口述资料。在土改时期口述史调查中,有大量女性老人接受访谈,并详细介绍了土改时期其所接受的动员内容,获得大量与妇女解放相关的事实材料。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院所进行的妇女口述史调查,其提纲中专门设计了土改时期与妇女解放相关的专题,详细了解到土改时期国家在动员妇女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工作。在口述访谈中,不仅先调查询问土改时期的政策记忆,引导他们自由讲述当时发生的故事、体验和个人经历,同时还询问了解他们当时的参与意愿和动员的效果,并鼓励他们进行自我的解释。口述访谈获得的大量真实而丰富的一手调查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详实的事实基础,大范围、大数量的事实材料成为了本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因此,本文才有机会在事实上尽可能探究中国社会性别意识下乡的问题。

二 土改时期社会性别意识下乡的路径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专制传统下,要想实现男女平等,推动社会平等意识下乡并非易事。无论民众的思想观念,还是国家的制度牵引,都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土地改革运动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男女平等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妇女口述资料的整理,这一时期的妇女动员主要通过宣扬男女平等的思想、推动妇女组织化建设、开展妇女诉苦教育等方式进行,逐步在农村传播社会平等意识。

(一) 改变传统理念,宣传男女平等思想

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封建道德习俗,长期以来将妇女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掌管家庭经济大权,在家里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而女性则必须受困于家庭琐碎生活中,相夫教子,不得外出抛头露面,不得反抗夫家的权威,如果一个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就会受到别人的指点,甚至会遭受到婆家和丈夫的打骂。因此,要实现社会性别意识的下乡,让妇女从种种桎梏中挣脱出来,男性对女性的看法以及女性对自身的认识转变是重要的第一步。

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之初,虽然有工作队下乡动员,但是困于封建传统绳索下的妇女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奋,而是有犹豫、有困惑、有观望。

工作组在土改没多久，1950年就来了嘛，有五个人，从外面来的，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年龄也不大。他们来村里经过我家门口，我看到过的，由村里干部带着，热情的很，看到我在门口晒衣服，还跟我打招呼，我就笑笑。我家他出来了，村干部相互介绍下，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就转身回屋里了。^①

在土改动员刚启动的时候，大部分妇女并不认为土改能给自己带来地位上的改变，只当土改是男人家的事情，和妇女无关。

以前人真是愚拙的很，封建的很，妇女哪有什么权利自由，不谈！搞土改，妇女都不关心，就知道在家干家务活。你看外面，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围成一团，问东问西的，妇女只忙自己的事情就行了。^②

可见，在当时不仅仅是男性看不起女性，连女性自身都认为自己就应当在家干家务，对自己的其他社会权利并不自知。因此，要实现妇女解放，妇女自身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为了让妇女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可以因土地改革运动而得到改变，让他们自己从封建传统的束缚中走出来，土改工作队加大了对妇女解放的宣传力度，帮助其解除思想顾虑，让他们能主动参与到土改中来。

工作队的人住我家，给我们进行思想灌输嘛，我都积极的很。在我家扎根，我们一家都搞饭吃，实在为我们穷人着想，问这问那的，问我们的生活情况。我觉得，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我们穷人。打从那开始，我就积极参加土改政策会议，用行动去支持土改，后来我渐渐就成了土改积极分子了嘛。^③

在动员妇女本人的同时，为了消除妇女观念转变之路上的阻碍，工作

① 来源于TFC的讲述。本文对被访者姓名采用学术化处理，即以名字首字母代替，下同。

② 来源于YYZ的讲述。

③ 来源于YYZ的讲述。

队也同步开展了对村内丈夫和婆婆的教育。男女长期的不平等状态，让村内的婆婆和丈夫对于妇女参加土改工作颇为不满，一位受访妇女在访谈中说道：“我家对口的王大姐，她有次从菜园回家，经过大海家，刚好工作队姓汪的看到王大姐。姓汪的非要招呼王大姐进来聊几句，几个村干部也在，就喊王大姐进来一起谈谈土改什么的。王大姐进去就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嘛，聊聊看法。不聊还好，一聊，被她家婆婆看到，回家把王大姐逮到一起吵。这下好了，村里闲言碎语的，讲王大姐不守妇道，跟一群男的坐在一起嘻嘻哈哈。那王大姐受到委屈啊，好多天不敢出门，怕被人指指点点的。”^①家中婆婆和丈夫对妇女参加村内活动的排斥与不理解，让长久以来遵守妇道的妇女难以接受，就算有参加的兴趣，也往往迫于压力，不敢参加。为此，工作队和村干部们加大了对丈夫和婆婆们的教育宣传。很多老人对工作队做家中婆婆和丈夫的思想工作的经历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枣镇村妇女部的人，特别注重解决妇女们的家庭矛盾，因为男人们都还认为女人不能干政，觉得女人根本干不了这个，地里的农活能干了就不错了，哪儿还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当时村里很多男人都觉得女人参加土地改革、进入贫农会也是摆设，如同笑话一般。我们就不断地给她们的丈夫、公婆们做思想工作，也做全村男性的思想工作，说明女性在这次土改运动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土地改革能给咱贫苦老百姓带来什么。说服他们转变思想支持女人加入贫农会参加土地改革真是件不容易的事，那种不太相信的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过我们不断的坚持也让他们渐渐接受女性参加政治活动了。^②

我们村的妇救会组织批判“坏婆婆”和“孬丈夫”，强烈制止他们对自己的儿媳、妻子进行的虐待行为，教育她们的丈夫和公婆，并将虐待行为是犯法的、是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等相关知识普及给他们。有妇救会帮妇女们撑腰，刚开始的时候，妇女们都不敢，想着自古妇女就是这样忍受过来了，哪还敢反抗，觉得不太可能改变几千年的妇女状况。妇救会就又改变策略，开始以“串门”“唠家常”的方式，改变妇女们的思想，动员妇女加入斗争，在妇救会的努力下，广

① 来源于 YZH 的讲述。

② 来源于 ZJY 的讲述。

大妇女也都开始相信可以帮助她们改变现状，便积极参与到斗争“坏婆婆”和“孬丈夫”行列中，尤其是深受婆家迫害的妇女。^①

就这样，土改工作队一方面做通妇女的思想工作，让她们知道自己并非与生俱来低人一等，同时，又积极摧毁阻碍其思想转变的旧传统桎梏，转变男性的思想观念。杨玉珍老人在口述中谈到自己丈夫受到教育的事情：

没想到，我家他知道后，不满意了，找我讲，不让我去，讲那不是妇女的事，在家待着，不准我再去开会。我就顶了他，结果，他就动手打了我，他脾气暴躁的很。这事后来传到村干部那，他们知道后，立马派人来家了解情况嘛，跟他讲道理，他哪听进去，不管那一套，不理睬他们。后来，工作队人出面，把他带到大会，让大伙评理。都讲他动手打人不对，把他教育一番，还跟他说，人人平等，妇女也有和男人一样的追求权利。他顶不住压力，不能不让我去开会。^②

（二）推动组织建设，吸纳妇女积极参与

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协会应切实注意吸收农民家庭中的妇女来参加，并吸收妇女中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工作。”^{〔3〕}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已经意识到，要充分将妇女动员起来，投身于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必须要加强妇女的组织建设，将长期游离于乡村组织之外的分散的妇女凝聚起来，以组织的建设来整合妇女。而在传统农村，妇女不仅仅难以走出家门，更是难以在社会组织当中有所表现，如果妇女们积极地热衷于一些社交活动，往往被家庭和社会当做不务正业的异类来看待，会遭受家庭和社会舆论的重重压力。

一是充分调动女性积极分子参与。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妇女之所以难以被动员起来，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妇女缺少走出家庭、争取妇女权利的模范和榜样，对于受困于封建传统之下已久的妇女而言，他们需要一些

① 来源于 CAL 的讲述。

② 来源于 YYZ 的讲述。

女性的积极分子来鼓励他们，因此，要将妇女从“女主内”的封建思想中拉出来，首先需要选拔妇女积极分子，并充分调动其参与社会活动。

妇女积极分子在选择的时候，并不是随便挑选的，而是更倾向于挑选那些平日里为人较为正派、在妇女当中威信比较高的妇女，她们一般都是出身贫雇农家庭，个人成分很单纯，受困较多，改变自身处境的动力比较足，同时，个人劳动能力比较突出，不仅是自家工作，也包括对于其他妇女劳动的组织能力也很优秀，这样的妇女，是发展成为积极分子的最佳选择。^[4]

有了妇女积极分子，妇女动员就如虎添翼，同为受压迫的女性，妇女积极分子更容易感同身受地去做其他妇女的思想工作，在有活动的时候，积极分子就负责去将妇女都叫到一起来开会，去做她们的思想工作，让她们意识到自己除了在家中相夫教子外，还可以走入到社会中，去做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同时，妇女积极分子也积极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来，像男人一样，从事一定的行政工作。在访谈中，不少妇女聊到积极分子在动员工作当中的作用时这样说道：

只要有会，他们就先通知我们积极分子，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喊人家来开会，还拉一些妇女跟我一道去开会，也要把她们都发动起来，力量才大。^①

减租减息那会儿，我们枣镇村户均占有土地增加了不少，当时妇女有一些人参与其中，主要是一些积极主动的妇女，这些人大多是妇救会帮助过她们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那些妇女，她们的思想解放得快，她们认识到了妇女也应该有政治参与权，并且相信共产党可以让她们拥有政治方面的权利。^②

那时候的工作队员为了主持诉苦大会，得找积极分子，专门找村子里的那些妇女老人，男人大多抹不开情面，妇女刚开始也是不敢说啥，后来经过宣传教育后，那一天，凶得很，很多男的都没妇女能干。^③

① 来源于 LXM 的讲述。

② 来源于 ZJY 的讲述。

③ 来源于 SML 的讲述。